

# 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

路璐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商业、经济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目前,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已逐步展开,在保护什么与如何保护方面取得一定成果。而研究不足也较为明显,如尚未清晰认知大运河文化带遗产类型、尚未聚焦大运河文化带的双重特性以及只是粗浅罗列、尚未精准梳理大运河文化带的价值维度。在研究展望中,提出把握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的三组张力即传承与重构、下沉与上升以及举国动员与深耕民意之间的关系,为大运河文化遗产开枝散叶、走向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言献策。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遗产;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4-0137-09

## The Study on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The Achievements, the Lack and the Advisements

LU Lu WANG Si-ming

(Branch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enter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China;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has made connection of commerce,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Chinese history. In 2014, the Grand Canal was listed in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nd was considered as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all mankind. Currently, studies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have had som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what is value to protect and how to protect,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is also obvious lack on the research, that i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heritage type of Cultural Belt of the Grand Canal, the doubl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Belt of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value dimension of Cultural Belt of the Grand Canal, which are not studied deeply and accurately. The aim of this study, three groups of tensions in the study of, namely, having a good command of 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sinking and ris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the public opinion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elt of the Grand Canal. Also, this study has made efforts to make ad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lead it to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to be shared by the public.

**Keywords:**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memory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绵延3200公里,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世

[收稿日期] 2019-07-1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乡村振兴视域下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以江苏为例(SKCX2018009)

[作者简介] 路璐(1980—),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研究分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科技传播史等;王思明(196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地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作物史等。

界运河中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大运河作为“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堪称中华文明的瑰宝，流淌在华夏大地的史诗，迄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文化遗产”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定义叠加。中国在借鉴国际表达，经过学界吸收与本土润色之后将“文化遗产”取代之前的“文物”用词，并将“文化遗产”界定为：由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存，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sup>①</sup>。文化遗产是民族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有效的记忆之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组成。

目前，随着大运河进入“后申遗”时代，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与外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知网检索“大运河”及“文化遗产”这两个关键词，总共搜寻到33篇CSSCI期刊文章，这些文章聚焦在传承与保护（15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8篇）、文化线路（3篇）、遗产廊道（2篇）、地域形象传播（3篇）、非物质文化遗产（2篇）等六大主题。厘定已有成果的价值，分析其不足，展望其未来研究方向，正是本文的起点与意义。

##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现状

### （一）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本体研究

对于大运河这种特定类型的文化遗产，学界用两种文化遗产的现成概念去阐释，即文化线路与遗产廊道。源于欧洲的文化线路概念更重视对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兴起于美国的遗产廊道概念对景观和游憩功能给予了格外关注。

在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文化线路被首次定义是由多种有形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在文化上的显著性来自于跨国或跨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多维度的对话，展示了沿线区域在时空上的互动。<sup>②</sup>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它一方面是时间的，“强调文化、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特别强调文化线路无形的精神属性和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sup>③</sup>另一方面，又是空间的，大运河北部连接国家首都，南部连接富庶的江南城市，“促进了南北文化这两大中国主流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影响了沿运地域文化之间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的发展。”<sup>④</sup>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遗产研究还强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它一端通过长安（今西安）承接陆上丝绸之路，另一端通过浙东运河连通明州（今宁波）联系着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中国与东亚的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还包括了隋唐时期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元代以后的基督教世界。”<sup>⑤</sup>此外，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特别强调产品与要素，有研究者从量化的方法入手分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的主题特征、空间特征和资源特征。<sup>⑥</sup>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概念则是美国绿道运动、景观建设和遗产保护理念共同发展与作用的产物。“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法案，法案中肯定了伊利运河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了对该廊道的保护与利用将在历史、文化、娱乐、教育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民族意义’。”<sup>⑦</sup>“从遗产廊道分类看，国内遗产廊道大致可分为河流线路型遗产

① 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 戴湘毅、姚辉：《国际文化线路理念演进及中国的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 王吉美、李飞：《国内外线性遗产文献综述》，《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

④ 刘士林：《大运河与江南文化》，《民族艺术》2006年第4期。

⑤ 陈怡：《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李永乐：《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

⑦ 奚雪松、陈琳：《美国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方法及其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4期。

廊道、道路交通型遗产廊道、其他类型的遗产廊道等。”<sup>①</sup>大运河无疑属于河流线路型遗产廊道。“从历史资源看,大运河遗产廊道属于‘古道’,大尺度的‘古道’,或跨经度线东西横亘,或跨纬度线南北纵贯,沿线的文化遗存呈带状分布,形成‘遗产廊道’,如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等。”<sup>②</sup>遗产廊道比文化线路更强调规划与整合,更强调人与自然的结合。对于大运河来说,“运用规划设计手段将某些具有某种联系的遗产资源联系在一起,结合功能相关、历史相关和空间相关进行遗产廊道的再次构建。”<sup>③</sup>

“大运河文化带”的提法从2017年陆续在论文中出现,有的研究者着眼于历史,“大运河的兴衰无疑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环节之一,由此造就的地域文化在空间上展现为一条纵贯南北的运河文化带。”<sup>④</sup>而“大运河文化带”这个概念在2018年官方文件正式提出后,有研究者开始从区位空间布局入手,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北连“环渤海经济带”,南接“长江经济发展带”,纵贯“一带一路”三大经济带。“同时从长远角度分析大运河将重塑中国地理格局、加快沿岸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城镇体系变迁、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对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sup>⑤</sup>较为可惜的是,这样一些深入研究与精彩论述并不多,更多的文化带论文着眼于某一特定地域的研究,聚焦大运河沿河某一地域的文化带建设,希冀打造地域文化名片,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尚缺论文从遗产本体、遗产特性等缜密论证何为大运河文化带,为何用文化带命名而不是文化线路、遗产廊道,或者比较文化带与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的同与异,以及评估该命名是否有可能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概括的拓展与补充,这些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研究方向。

## (二)保护什么与如何保护

大运河目前的研究中,传承与保护研究最为充分。保护什么,这牵涉到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总体边界与相关内容的界定与认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构成,首先是有形的文化遗产,多种分类与介入方式,有研究者着眼于运河水文化本身,将运河水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类: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和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围绕着水、水事、水利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sup>⑥</sup>“也可以从水、岸、城三种划分,水是大运河的根本,岸是大运河的经络,城是大运河的明珠。可以结合大运河沿线各地的特点和优势,采用水、岸、城建设一体推进的思路。”<sup>⑦</sup>

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方面,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可为研究大运河对流经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提供鲜活的实证材料。目前研究是沿河沿线分段式的探索,集中在个别地段,如有学者对运河淮安段展开调查,初步整理以下文化遗产类型:“与运河相关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与运河文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富有个性特点的民俗;富有艺术张力的民歌、戏剧、舞蹈;创造了富有个性特征的技艺;运河哺育地域历史与文化。”<sup>⑧</sup>也有学者聚焦山东段,“发现其运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级的不同等级,如聊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等等。”<sup>⑨</sup>可以说,任何一个单一地段的文化遗产整理是需要的,但是一种宏观的、整体视角更是呼之欲出,运河沿线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摸底与归整还待进一步展开。

如何保护聚焦整体性与活态性。“整体性针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分布沿线广、体量巨大而考量的,有学者针对运河遗产的范围界定不清,遗产赋存状况缺乏清晰的调查、发展程度不均,保护意识淡漠,保护理

① 张定青、王海荣、曹象明:《我国遗产廊道研究进展》,《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梁保尔:《古道游研究》,《旅游科学》2015年第2期。

③ 柯彬彬、张镒:《海峡西岸遗产廊道构建意义及谋略》,《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④ 孙冬虎:《运河文化带:自然与人文的交响》,《前线》2017年第8期。

⑤ 孙久文、易淑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中国区域空间格局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⑥ 张志荣、李亮:《大运河杭州段水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中国文化报》2012年8月16日。

⑦ 夏锦文:《保护好流动的大运河文化带》,《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4日。

⑧ 张强:《京杭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⑨ 徐奇志、王艳:《大运河(山东段)文化遗产及其活态保护》,《理论学刊》2018年第6期。



念缺乏科学性,认为急需进行统筹协调,呼吁建立一门全新的‘运河学’学科;并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合作、分工明确、共同管理机制。<sup>①</sup>活态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通行规则,可以为探寻大运河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并确保其持续生命力提供路径。有研究者提供了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途径:“恢复和延续大运河的原始功能——航运、打造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特别重视活态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等等。”<sup>②</sup>有学者更强调“文化遗产网络与系统的相关性,强调文化遗产与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统一整体,探索基于复杂巨系统的‘活态’遗产保护。”<sup>③</sup>

## 二、研究不足

### (一)尚未清晰认知大运河文化带遗产类型

以文化带命名大运河这种文化遗产,首先应承认大运河是复杂巨系统文化遗产类型,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先生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其应用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系统是‘开放的’,也就是系统本身与系统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2)系统包含很多子系统,成千上万甚至是上亿万,所以是‘巨系统’;(3)系统的种类繁多,有几十、上百甚至几百种,所以是‘复杂的’;(4)正因为以上几个特征,整个系统之间的系统结构是多层次的,每个层次都表现出系统的复杂行为,甚至还有作为社会人的复杂参与。”<sup>④</sup>

大运河遗产体量巨大,共包括中国8个省、直辖市的27座城市,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大运河种类丰富,作为巨型文化遗产,涵盖河、岸、城,综合物质、精神、制度三种遗产类型。既包括具体的文化点,也包括名街、古镇、城市等文化片。“同时文化带中的点、线、面又与周边环境、运河母体时刻进行着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是不同文化空间交汇而成的连续性统一体。”<sup>⑤</sup>沿河城市与村镇作为镶嵌在河岸的明珠,有效构成了文化带的“宽度”。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规划纲要》明确的“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整体思路正是一种纲领式的概括。

其次,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出是中国文化遗产特色与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之间的有效对接。对于运河类文化遗产,欧洲常命名为文化线路,美国常称之为遗产廊道,虽然不同概念背后暗藏的是特定文化语境母体对特定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与保护途径选择,如文化线路更强调产品与要素以及不同文化时空之间的链接与交流,而遗产廊道则更聚焦人与自然的融合,文化空间与生态环境的全民共享等等,但是它们都指向“融物质性遗产与非物质性遗产于一身及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特征以及动态生成与富有生机的、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并可能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sup>⑥</sup>大运河文化带聚焦“文化带”这一关键词才刚刚开始,可以初步判断的是,从“带”状空间看,大运河文化带既是不同历史时段沉淀的历史文脉,也是不同文化空间的交融与交汇,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汇聚,城市与村镇构成了“带”的“宽度”。对于文化带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类型的提法,学界还需深入研究与阐释。

### (二)尚未聚焦大运河文化带的双重特性

① 刘庆余:《“申遗”背景下的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② 徐奇志、王艳:《大运河(山东段)文化遗产及其活态保护》,《理论学刊》2018年第6期。

③ 阳建强:《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2016年第4期。

④ 姚迪:《巨系统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究及现实困境的思索——以大运河保护规划为例》,《城市规划》2010年第1期。

⑤ 路璐:《擦亮大运河文化带这一国家名片》,《红旗文稿》2019年第13期。

⑥ 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大运河文化带第一重特性是多样性。大运河文化带的多样性体现在包罗万象:无论是古运河还是今运河,无论是河道行船、船闸衙署、天下粮仓、沿河水利、码头、蓄水库乃至运河名城与村镇,还是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文学、艺术、美食、园林民谣等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多重区域文化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然而,这种多重区域文化“并不是杂乱堆砌,而是多元中的统一,因为大运河沿岸各特色地域文化均贯通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携带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正是在共同文化魂魄的统摄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会在历史的烟波中走向融合,成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sup>①</sup>

第二重特性是流动性。流动的文化大运河首先体现在时间。大运河距今已25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的改道、拓展、改建各个时代都在发生,如秦汉时期江南运河的形成、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唐宋开凿龟山运河等,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蓬勃以及与国运起伏相连的“废漕令”等等,这条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运行最久的大河是一部流动的厚重史书。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还体现在空间上的传播,融通多元文化区域,勾连中华民族对自我与世界的想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突出的就是它流动中的文化融通这一卓越特质。

大运河文化绝不是静止的文化,把大运河看作历史遗留物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研究视角所架构起来的整套话语,带来的不仅是大运河本身的理论研究危机,而且也会造就大运河文化遗产在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的危机。变迁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生命”本质,包涵了它在具体时空层面生成、传承,革新的全部进程,标志着永不停滞的深层生命运动和丰富久远的历史文脉传承。

### (三)尚未精准梳理大运河文化带的价值维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文化遗产是对历史的一种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姿态,对其的价值梳理应该首先真实地梳理历史,才能清醒地面向未来。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专著《明代的漕运:1368-1644》开篇先抛出一个问题:1368-1644年西欧把中世纪抛在脑后,大步跨入现代社会,科技急速发展,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同时期的中国,在任何意义上来说,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不错,却错过了这一段使人奋发的岁月?

或许宏观解答是中国大运河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基于皇权标准的社会控制,未从农耕文明转变为近代工业文明形态,也未能产生实现这种转变所依赖的先进技术基础与制度条件。从中观角度聚焦有明一代的运河,不难发现明朝漕运的悖论:明代依赖漕河这种内陆运输的同时却在15世纪后半期严厉禁止海运,大运河就成为了一个孤立的内循环体系,“其性质是强迫中国不依赖外在环境”;明代漕河体系的运作解决了南粮北运的问题,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设置了许多成本大、浪费多的程序”;对于民众,漕河并未使沿河地域的经济真正活跃起来,而“明代帝王和大臣常常把子民的健康挂在嘴边,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恰好使百姓能够生存下来,并不努力向上去改善子民的生活。”<sup>②</sup>我们今天开采大运河这个历史的富矿,更多地需要辨析、挑选,择其精华而点石成金。

历史学家葛剑雄犀利地指出应当实事求是了解和研究大运河历史,不要因为历史事实与今天的目标不同就回避隐瞒,更需要清醒辨证地看待“大运河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创造性转化:

大运河的修成和通航对国家统一、政权巩固、首都地位的维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运河文化中地方服从中央、举国一体、创新文化等精神需要弘扬和提升,而

<sup>①</sup> 路璐、王思明:《准确理解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新华日报》2019年2月12日。

<sup>②</sup> [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其中腐败、奢靡和秘密会社性质的糟粕应当坚决抛弃。工程、建筑、水利、规划、管理、园林、饮食、书画、戏曲、工艺、风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要尽可能加以保护、保存、记录,但在继承发扬时也要有所选择,进行创造性的转化。<sup>①</sup>

从世界运河范围看,运河是人工河流,比自然的产物更能承载历史的赠予、国家的意志,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大运河当然是古代中国伟大的工程创造,大运河遗产包括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化价值,但是古代的大运河也是深嵌在时代的背景中与传统的文化模式里,因此当今我们在梳理、承续、开采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时,也需要清醒地看到社会语境的整体变迁以及文化整合的当下形态,这样才会有更清晰地承接与创新。

### 三、研究展望:把握大运河文化带遗产研究的三组关系

#### (一)把握“传承”与“重构”的张力

传承与重构并非天然对立的,传承不简单局限于保护,重构也并非只是惯常认为的开发。传承与重构有内在的勾连,它们是富有张力的一组概念。其一,传承与重构都是深嵌在时代的背景板中。文化遗产的重视是在一战、二战之后人类在杀戮与毁灭的瓦砾与废墟中站立起来,在黑色的思想背景中朝往日家园中回眸凝望,试图寻找往昔田园牧歌的宁静。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潮与实践,正是当代社会对现代化进程深刻而不无沉痛的反思,与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现代性”息息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在现代化急剧发展对文化遗产的大量损坏后,甚至可以说,现代人的乡愁恰恰是在不能还乡之后,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保护恰恰是在毁坏之后。

其二,传承与重构辩证生成,传承本身就是某种重构。传承的本质是关于“过去”,而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阐释“过去”本身在任何记忆中都不能被完全保留,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为“社会在每一时期中,借助这个时期的参照框架所能重构的部分,回忆中没有百分百纯粹的事实”。<sup>②</sup>而重构也具有传承性,因为它的具体方式就是将历史中富有意味的场景、符号与记忆“拉进”当下的框架中,因为“作为断裂的后果,当代人对自己时代的文明成果接受历史的挑选时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命名,它不仅仅是面对过去的继承行为,还是面向未来的传承行为,它虽然是当代的事件,却保持着对过去的追溯和在未来的持续。”<sup>③</sup>由此可见,传承并不必然属于历史的范畴,重构也不必然属于当下,它们都游弋在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

把握传承与重构的张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深邃的研究思维框架。传承与重构在这条沟通南北,贯穿古今的大河中参差互见,我们需要保护记忆之场中的多重性文化空间。借用诺拉的关于文化“复数”的说法,活态的历史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了“复数的乡村文化空间”:江南的水乡情韵、苏北运河的大河横陈、千年农耕文明、近代工业遗产、信息化时代的ETC过闸系统、新媒体时代的漂浮的运河虚拟体验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化景观。传承运河文化遗产,就是要体认它的多样性,体认其在不同记忆之场“蜿蜒曲折之处,以概念所特有的起承转合方式表现出最纠葛缠绕的样式,以及无比细微的真相——历史并非一个以一贯之的线索,而是类似于砖块的堆砌。”<sup>④</sup>

还应看到,世界运河范围内,重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重构有三个维度即价值转向、国族呈现与主体追寻。世界上大部分运河都有价值转向,里多运河、米迪运河等等原先开掘目的多着眼于军

①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③ 刘壮:《论文化遗产的本质——学科视野下的回顾与探索》,《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④ 蓝江:《从记忆之场到仪式——现代装置之下文化记忆的可能性》,《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



事用途,现都成为后现代社会文化品牌与旅游品牌的打造与竞争。如加拿大里多运河节展示了里多遗产、积极生活方式、世界遗产—环境节日三个主题。“三大主题包括艺术和摄影展览、运河船闸站的导游参观、世界遗产广场的现场舞蹈和音乐表演、加拿大自然博物馆的里多生态展览、生物圈能源博览会、里多船队游行、遗产步行和独木舟旅游,还有烟火。”<sup>①</sup>米迪运河诞生时具有重要的商业运输和航运安全的价值,为法国提供了一个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内部水路运输路线。“1996年法国米迪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重点开发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凭借着其独特的运河建筑风格、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独具浪漫气息的风土人情、领先世界的葡萄酒文化品牌将周围的文化遗产与景观有机的串联起来,成为法国南部重要的风景与娱乐资源。”<sup>②</sup>

国族呈现。民族国家积极征用文化资源,呈现国家形象,形成文化认同,如美国的伊利运河自建造以来至今不到两百年的历史,在这近两百年内却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按照约瑟夫·奈对软硬实力的区分,而伊利运河正是军事硬实力向文化软实力价值转型的典型个案。“往昔伊利运河在维护美国南北战争中维护国家统一,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确保了美国在五大湖跨国地区的支配地位。”<sup>③</sup>当下,伊利运河主题公园、遗产廊道、绿道小径等等成为伊利运河聚焦的文旅项目。民族国家往往征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身份的标识,伊利运河采用了“美国的象征”的核心叙事母题,以“力量与发展”、“连接与沟通”、“发明与创造”、“统一与多样”四个次级主题进行叙事建构<sup>④</sup>。

强调沿河主体的当下生活感受。这是强调运河文化保护中的社区建设与当下的生活面向。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并非只有博物馆类型的保护和旅游市场与产业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世居于运河主体的文化感受往往是最重要的。如日本小樽运河保护运动由当地居民自发组织沿河社区居民自己去寻找城镇中有意思的建筑、街道、色彩等元素,富有人情味的民宿接待游客,并把他们的生活感受传递给游客。

## (二)把握“下沉”与“上升”的张力

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需把握“下沉”与“上升”的张力。“下沉”是夯实基础性研究,聚集专题式研究,特别是要聚焦大运河研究的根与魂——农耕文明。例如江苏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江苏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娄勤俭书记任组长,并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承担并建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总院,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江苏大运河“文化遗存保护、文化价值弘扬、生态保护修复、沿线环境建设要走在前列”的具体要求。2018年,研究总院以大运河沿岸城市为依托,建立了苏州、淮安、徐州、扬州四个城市分院。2019年5月26日,江苏省内首家大运河农业文明研究专题分院——南京农业大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研究分院正式成立,这是江苏省内首家批准成立的专题式分院,它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研究。

分院所依托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聚焦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文献学、农业文化遗产,是学界知名的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的科学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为大运河农业文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分院以农业文明为研究切入点,充分发挥其农耕文明研究优势,立足于以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融合、农耕文明与沿岸村落与城镇兴衰互动、农业仓储设施及水利设施的发展、农业风俗风情与社会联系相互影响、运河传统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等形成的多维融合文化体系,集结各方资源,形成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的复合体,希冀真正实现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大运河《规划纲要》中要求的: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

① Donohoe Holly M: Sustainable heritage tourism marketing and Canada's Rideau Canal world heritage site, Journal Of Sustainabal Touris, XX( January, 2012), PP, 121-142.

② Comair、Geogers、Frendrich、AugustineJ: Water Management for the 17th Century French Royal Canal of the 'Two Seas', World Environmental & Water Resources Congress, ( May, 2015), PP, 194-203.

③ Carol Sheriff: Stairway to Empire: Lockport, the Erie Canal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 by Patrick McGreev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ume 97, Issue 1, (June, 2010), Pages 174-175.

④ 奚雪松、陈琳:《美国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方法及其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4期。

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

“上升”,文化遗产本是一种标示自在状态的文化资源,当其被命名为遗产时就是一种公共文化的选择—产生机制,整个社会已将其选定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标识之一,完成了对其价值评估与社会命名而成为公共文化。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宏伟史诗,对其文化认知与认同指向民族身份认同的宏大议题,理应上升到公共文化空间,它的复兴途径绝不仅仅局限于学者理论研究的书桌上,也不仅仅是文化产业与旅游景点中惊鸿一瞥的风景点缀。大运河从苍茫的历史中走来,应真正走向民众的日常生活,运河的风物掌故、歌谣诗赋、风味美食、民俗民风都应上升到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并在其中开枝散叶。

“上升”还包括面向世界的运河研究,积极参与世界运河遗产的研究对话,发出中国声音,拥有国际学术话语权。在 Web of Science 检索相关 SSCI 论文,从 2009 年到 2019 年运河类文化遗产 SSCI 文献共 246 篇,多集中在“伊利运河”、“米迪运河”、“里多运河”,跨学科研究频繁,角度也较为新颖。目前,随着 2014 年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中国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论文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自申遗成功以来国际学术界共有 8 篇 SSCI 相关英文文献。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保护与开发的重大挑战是忽略了多个文化景观之间的区域或跨区域联系。因此,文化景观不能从宏观和全球的角度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很难确定保存和识别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核心要素的优先顺序。”<sup>①</sup>还有学者关注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社会价值的探讨。<sup>②</sup>也有学者将“传播学与文化遗产学融合,探索新媒体时代大运河的虚拟化叙事与沉浸式体验”<sup>③</sup>,但是就国际高水平文献的整体发表情况看,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研究只能说刚刚开始,量与质都需要加强。

### (三)把握“举国动员”与“深耕民意”之间的张力

在“后申遗”时代,大运河的保护运动中举国动员与深耕民意是矛盾的吗?时而听到不断出现的对立论,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大运河的八年申遗历程,彰显出典型的中国特色;申遗过程中的国家在场与各相关利益群体间的权力博弈,彰显了文化遗产申报背后的‘遗产政治学’,其造成了对原有社区历史的矫饰和文化灵韵的销蚀。因此,保护好大运河就在于国家力量退场,解决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问题。<sup>④</sup>

把握好这组关系之间的张力,首先要问国家力量在场意味着什么?这要从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谈起,学者张举文提到在过往的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一封来自玻利维亚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部长的信,“信中核心观点是,文化遗产需要得到国际法的界定,将其界定为国家财产,为国家拥有和管理的遗产。”<sup>⑤</sup>这是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端,这个开端肇始于第三世界国家用国家力量保护非遗,其本质在于民族文化资源本身就不是“自然”的、“天赋”的,它对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环顾当下,动用国家力量保护文化遗产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的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被认为承载着美国形象,加拿大的里多运河被定位为“国家宝藏”被加拿大政府和 3000 多家企业联手打造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我国的大运河保护与建设从 2014 年多哈申遗成功到 2018 年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倡议、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倡导建立由国家发改委等 17 个部

① Wang fang: Belt or network?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shaping mechanism of the Great Wall cultural belt in Beijing,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8(9).

② Qiaowei Wei: Negotiation of Social Values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ing Processes: A Case Study on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China, Journal of the 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 2018.

③ Shengnan Chen: A case study of user immersion-based systematic design for serious heritage games, Multimed Tools Appl, 2013, 62: 633 - 658.

④ 刘朝晖:《“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文化遗产》2016 年第 6 期。

⑤ 沃尔迪玛·哈福斯坦、张举文:《山鹰之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造过程》,《文化遗产》2018 年第 5 期。



门以及北京市等八个省(市)组成大运河联席工作制度,国家力量正是在一路推动大运河的保护与建设。

其次,举国动员与深耕民意是否殊途同归,并行不悖?或许在有的学者眼里,举国动员强调的是一种宏观的集体记忆,而深耕民意、征召个体强调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体性的记忆。如果一定要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对立起来,这本身就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窠臼。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主体只能是集体或许是激进的,但记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却是不争的事实。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凝聚性结构”来解释,它是参照框架,“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回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sup>①</sup>人只有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才形成记忆。凝聚性结构联接昨天与今天,使刻骨铭心的回忆与经验固定下来并保持现实意义;凝聚性结构通过象征意义体系联接当下生活的主体,使我成为我们。国家力量的介入往往正是通过凝聚性结构这种富有趣味的中介,用节日、仪式化以及重复的记忆将集体记忆提升到文化记忆,因为这事关一个民族的回忆、认同与文化延续。

对于大运河来说,举国动员与深耕民意的理想状态在于它们能高度结合,大运河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中正是“被唤醒的空间,被经历的时间。”这条开凿于春秋,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是中国文化的记忆之场。记忆之场是在自然空间中加入符号,大运河整体被升华成中华文明的重要记忆符号,因为它“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鉴真东渡、玄奘西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繁华盛景等等穿插其中,这条文化线路勾连起中华民族自我与世界的交流。”<sup>②</sup>

作为历史灵韵的保有,大运河确实需要以当下生活主体热爱的方式深耕民意,集体记忆需要个体记忆的源头活水,国家力量也需要下沉,需要为每一个个体提供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可以说,鲜活的文化记忆与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通常潜藏在沿河民众日常生活的各类民俗事象和风俗文化中,如金龙四大王信仰,它在明清时期盛行于大运河区域,被称为运河漕运之神,是运河沿线供奉最多的水神。淮安,宿迁,苏州,聊城等都有,仅淮安就现存14座金龙四大王庙;再如洪泽湖渔鼓舞是一种江苏省的传统民间舞蹈。早期洪泽湖流域湖区渔民烧还愿或祝祷时的祭祀舞蹈形式,具有着浓郁的渔家风格与广大的流布范围;还如“运河伞棒舞”是位于鲁西地区的一种集伞棒舞、扭秧歌、火流星等为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等等,这些构成了吉奥乔·阿甘本的“神圣仪式”。如果没有这些,徒有其表的物质外壳与记忆之场也会沦为一种沉默的、丧失生命气息的存在物。阿甘本敏锐地看到,当时鲜活的、具有生命形式的存在物不可能在当下的语言装置和影像装置中复活,因为被复活的永远是赝品——一种与当下现代文化完全同质的文化空间。<sup>③</sup>所以,其精神核心都在于文化共同体的情感交流与意义分享,这对当下的运河保护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深耕民意还需注重开放话语体系,立足当代生活主体的美学旨趣,积极利用新的媒体传播方式。“既要重视权威和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也要重视草根和大众的自我创作和市场扩散,让与运河相关的文化活动与艺术事件像阳光,水和空气一样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场景。”<sup>④</sup>特别注重新媒体虚拟环境中打造“我与运河一起重生”,用虚拟景观、虚拟运河社区,通过动画剪辑展示大运河水运景观体系全貌,勾勒出运河沿线的主要文化遗产,展示古城的文化遗址,通过用户与全景的互动展示,允许用户通过虚拟导航切实感受与运河相关的文化、历史、艺术和故事。这颇有些像德勒兹提出的“水晶象”,古运河、今运河,流动的河,历史的河,生活的河流,不同生命体的历史在此交汇。

①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② 路璐:《擦亮大运河文化带这一国家名片》,《红旗文稿》2019年第13期。

③ 蓝江:《从记忆之场到仪式——现代装置之下文化记忆的可能性》,《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

④ 戴斌:《文化遗产的功能重构与价值实现》,中国旅游研究院官网,2019-05-06, <http://www.ctaweb.org/html/2019-5/2019-5-6-10-3-06311.html>。